

苦难与信仰

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胡卫清 著



苦难与信仰

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胡卫清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难与信仰：近代潮汕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 胡卫清著.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3.6
(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
ISBN 978-7-108-04508-9

I . ①苦… II . ①胡… III . ①宗教史－研究－潮州市－清
后期 ②宗教史－研究－汕头市－清后期 IV . ①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9644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4
字 数 353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0.00 元
(印装查询 : 01064002715 ; 邮购查询 : 01084010542)

总 序

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在饶宗颐教授攘臂一呼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开始在各方面发展。短短数年间，已汇众千百潮人学者，而整体研究也已总括为一门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特学问，以“潮学”闻名于国际文化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心的成立，并期刊及专著的出版，如雨后春笋。至今，我们对潮汕区域历史、潮籍历史文化名人、潮人的海外拓殖史、潮汕区域政治经济状况、潮汕文化源流、潮汕方言、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剧、潮汕工艺农艺、潮州饮食文化等，都已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然而，潮学研究成果虽丰，在宗教研究方面，却未见相应之发展。当然，在潮学圈中，也有学者就潮汕地区各宗教以至基督宗教的文化、历史、与社会之互动等等做了一些探索，例如对祠堂、庙宇、祖宗崇拜、风水、亡斋风俗、宋代潮州的佛教等的研究，又例如对潮汕地区基督宗教传播、清末潮汕地区的基督宗教运动、20 世纪教会办学的命运、汕头基督宗教教会的自立与分离、个别基督教宗派及差会的历史描述等的研究。然而，这方面的功夫，至今仍然只属初探阶段，当中存在着不少有待填平的研究洼沟。对不少学者来说，这是极为可惜的，但却也是开展研究领域之良机。近二十多年，中外学者常谈到第二轴心时代的全新文明，谈到当下

的全球意识、全球在地意识、大地意识、对话意识、女性意识等，亦留意到在新时代里，宗教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及其重建之急切性。事实上，数十年来，我国的宗教研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在哲学、文学、历史研究、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研究、人类学、艺术研究、建筑学、法学等领域里，都对宗教进行了学术探索。今天，即使在不少历史悠久的重点大学里，也能找到宗教研究机构以至于学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重大成就之一，而宗教学亦由往日的“险学”转化成今日蓬勃发展的“显学”。

毫无疑问，潮汕是一个宗教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当中的基督宗教也不例外。基督教传入潮汕区域已超过 160 年。这即是说，在汕头开埠（1860 年）前，基督教已存在于此地。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早于 19 世纪初，潮汕地区已是欧美传教差会欲求开发之地。在过去年间，基督宗教在潮汕非常活跃，在创办医院、办学、慈善事业、妇女工作等方面，都有足迹。不单如此，在潮州的商业史中，传教士也有涉足，例如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于潮州商贸领域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抽纱工艺，正是传教士引入的。我们认为，潮学有必要注入基督宗教研究的元素。

此外，潮汕基督宗教研究，在国际学术圈子里，也是一个值得发展但仍是有待发展的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基督宗教之研究重心，已由研究整体转移至地方观点（local knowledge）的研究，学者们亦力求深入探讨基督宗教与地方社会及宗教的互动关系、基督宗教本土化的不同形式，及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区域差异。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之东北。在民国初，广东受餐基督徒人数已超过 30 万，是全国之冠。时至今日，广东教会里仍是潮语系的教会最为兴旺。因此，不论从历史看或是从现今看，研究潮汕基督宗教，就了解华南基督宗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我们决定出版“潮汕社会宗教与文化研究系列”的原因。这套丛书，广邀了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参与，从全球在地化、性别觉醒、建筑、历史、社会、文化、宗教、人生等向度切入，发掘蕴藏在潮汕基督宗教中的人文宝藏，以多元的视野为当下的新文明中宗教人文精神的深化提供资源。

得蒙李嘉诚基金会的鼎力支持，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力合作，“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研究中心”于 2010 年初正式成立，重点研究粤东地区

基督宗教史、粤东各地基督宗教和其它宗教的现状、基督宗教哲学与神学、基督宗教与潮汕文化、基督宗教与社会之互动、基督宗教与妇女发展、基督宗教伦理学、基督宗教和学校教育、基督宗教和全人生命教育、基督宗教和慈善及医疗事业、潮人成就与潮人的宗教信仰等等。至今，我们已成功地汇聚了不少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并曾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及圆桌学术交流会议，还设立了相关的优配研究基金。2012年9月，“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亦得以成立，把潮汕基督宗教研究的工作再推上一层楼。本丛书得以面世，得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专业出版支持，我们深感荣幸。有各方的支持，我们深信，本丛书能给海内外学者及读者带来一种人文新视野，并为潮汕地区的基督宗教研究做出贡献。

汕头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关瑞文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目 录

1 导论

42 第一章 地缘与亲缘：教会医院与福音网络

43 一、教区医院体系

47 二、医学影响与本土反应

58 三、医院与福音传播

69 第二章 性别与信仰：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

71 一、统计意义上的多数群体

80 二、妇女传道与教会体制

94 三、启蒙后的苦难与得救

106 第三章 教规与生活：基督徒的礼仪俗事

106 一、礼拜与圣礼

117 二、婚姻规条与礼仪

127 三、基督徒的葬礼

- 140 第四章 坂依与禁革：纯正信仰的尺度问题
- 141 一、从偶像到耶稣
- 146 二、生命与灵性
- 158 三、固守与变通
- 167 第五章 天路与商道：海外潮人与潮汕教会
- 168 一、早期教会之间的往来
- 172 二、潮汕对南洋的人力协助
- 177 三、南洋对潮汕的经济支持
- 185 第六章 精英与草根：黄冈堂驱逐教牧事件
- 186 一、事件背景
- 189 二、风波初起
- 192 三、争斗只为稻粱谋
- 198 四、区会的抉择
- 215 第七章 我们与他们：华英学校风潮解析
- 216 一、短暂的蜜月期

223	二、拜孔风潮
238	三、“革命外交”的典范
250	四、“敌人”的抗争
259	第八章 圣谱与家谱：教会历史的书写
260	一、差传话语模式
269	二、本土教会的历史建构
278	三、教会谱系与教牧家族
292	四、民族主义的挑战
304	结论
308	参考文献
325	附录一：近代潮汕传教士中西人名对照表
329	附录二：岭东浸信会妇女传道及女信徒传记
372	后记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不同宗教之间，尤其是东西方宗教之间的比较与对话在宗教学诞生之前就已出现。以中国为例，早在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之后，中西之间的宗教对话就已正式展开，无论是罗明坚最初的援佛排儒，还是利玛窦的合儒、补儒、超儒，都体现了基督教对中国本土宗教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而本土人士徐光启的“中西会通说”和杨光先的“请诛异教”主张则集中反映了儒学士人对基督教的两极态度。至于那场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礼仪之争，更印证了实践意义上的宗教间的对话远比宗教学界内的对话要艰难得多，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甚至在三百年后将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也卷入进去。¹当麦克斯·缪勒对伦敦会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等对儒学较为宽容的主张表达赞同的态度之后，反对理雅各的传教士居然以匿名方式在传教刊物上对麦克斯·缪勒进行教训批评，²以致后者不得不迎战，准备决一胜负。

1 [英] 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3—191 页。

2 Inquirer, “A Letter to Prof. F. Max Müller on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XI(May–June, 1880), pp.161–187.

回溯历史，当时争论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即 Deus 或 God 的术语翻译问题、祭祖和祀孔问题。关于这场争论本身的缘起过程及其意义，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¹不过由这场论争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则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身份认同不仅成为基督徒自身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成为教外人士攻击基督教的一个关键着力点，“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类似言论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反复被提起，这导致本土基督徒必须反复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中国基督徒”，而这类证明言行的本身所预设的问题就是成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是否有可能。

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刻板印象，从清代禁教时期的“邪教”到近代的“洋教”，这种高度脸谱化的政治勾勒使中国基督教的真实形象相当程度上被掩盖，而其所形成的群体记忆则成为中国教会沉重的历史遗产。笔者多年前在广东潮汕做田野考察时发现，当地人在划分宗教信仰时将该区域所有的人划分为两类，即“拜老爷”者和“吃教”（潮州音“挟教”）者两类。所谓“拜老爷”是潮汕地区一种非常普遍的传统民间信仰，这里的“拜”是指一种对神明的祭祀活动，根据神明的等级来决定“拜”的规模，既有个人和家庭的私人崇拜活动，也有由地方精英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公开祭祀和游神赛会活动，“拜”的对象极为庞杂，既包含道教和佛教的神明，也包括各类地方神明，更包括列祖列宗。这里重要的是“拜老爷”者在当地不仅人数上占绝对多数，而且他们以是否“拜老爷”作为认同和区隔的标准，凡拜者自然是“我们”，否则就是作为另类的“他们”。而“吃教”的说法既包含对近代“洋教”的历史记忆，也是对当代基督徒群体信仰的一

¹ 关于礼仪之争的重要著述有 George Minamiki,S.J.,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关于近代《圣经》中译中的译名问题在近代的争论参见: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eman(1801–1860), *American'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253–292; 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种价值判定，因为“拜”自然是一种神圣的崇拜，是真正的信仰活动，而拜的对象“老爷”实为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符号象征的各类神明，而“吃教”的重点在“吃”，显然不是真正的信仰，且信的对象是外来之神，所以尽管“老爷宫”包括各种神庙祠堂，却将基督教堂排斥在外。令人惊讶的是，基督徒对本地民众的分类也是两类，即“信耶稣”（或“信天主”）者和“拜老爷”者，只不过将这一“信”一“拜”之间的价值判定倒转过来，即“我们”是有信仰者，而“他们”则是偶像崇拜者。应当指出的是，信徒与非信徒刻意将彼此区隔开来的现象并非只是一种地域性的个案，事实上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¹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当下，而当下是绵延而来的历史。关于当前教会处境的解读，事实上与中国教会历史存在密切的关联，不过笔者无意回应中国人能否真正接纳基督教这样宏大问题的争论，²也不打算重新检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所谓排外主义传统的问题。³在笔者看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是有无符合传教士标准的所谓真正的中国基督徒，也不是中国社会文化能否接纳外来的基督教，而是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究竟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的，换句话说，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经验究竟是什么。

基督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不过其普世性是通过各种地域性的实际传播来展现的，作为信仰载体的基督徒本身就是由基督教的普世性和社会文

1 李峰在分析浙江某地区的教会组织机构的功能特征时就认为，“当地教会是一个互益性的非营利组织，整个组织系统的运作过程具有相当的内向型特征”，参李峰：《乡村基督教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结构位秩——华南 Y 县 X 镇基督教教会组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 谢和耐持否定的态度，而钟鸣旦和柯毅霖则通过个案的研究反对谢和耐的看法，参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圣神研究中心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柯毅霖：《晚明基督论》，王志成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3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 年版。

化经验的地域性交互塑造的产物。因此中国基督徒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论证是否存在所谓真正的中国基督徒不仅是一种宗教偏见，而且在逻辑上也很难讲得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督徒”作为一个集合性概念，其本身仍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属性是中国各地基督徒特征的综合，并不存在脱离地域性经验的一般“中国基督徒”，所以，本书的视角仍是通过地域性的个案来观察和分析近代基督徒的宗教经验。

本书所指的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并非局限于威廉·詹姆斯所指的宗教心理——¹ 尽管宗教心理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重要对象，而是泛指基督徒的一般生活经历，它既包括基督徒的神圣生活的一面，也包含其与神圣生活密切相关联的世俗生活。在个体层面，本书将讨论生存境遇与个体皈依之间的关联；在社区层面，将讨论基督徒个体皈依对于家庭、家族的意义，讨论基层堂会教牧与信徒的生活；而在较为宏大的社会层面，则会讨论近代政教关系对教会和基督徒生活的影响，因为在近代民族主义高唱入云的时代，基督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始终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应当说明的是，作为一个非信徒来研究基督教史，其本身的立场很容易引起基督教界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研究基督教与其外部社会的互动关系，即主要研究“基督教与什么”，而不是“基督教是什么”的问题。与港台及海外学者相比，内地基督教学者多无教会背景，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回避信仰问题，尽管有可能被教会内学者视为隔靴搔痒，但其实是很明智的选择。至于选择基督徒的宗教经验作为研究对象，直面其信仰生活，则可能带有较大的风险，会受到无宗教经验者如何研究宗教经验的质疑。不过，只要不持绝对的信仰主义的态度，不将基督教研究作为基督教神学的附属物，² 不将宗教经验过分神秘化，那么作为中国人经验生活一部分的基督徒的宗教经验被理解应不是困难之事，何况这些经验已经以史料的形式客观地保存下来，无论信教与否，均可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

1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蔡怡佳、刘宏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吕大吉：《译序》，载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解读，而笔者的非信徒立场应是学术中立的一种保证。

二、学术史综述

相对于主流学术界，在学界一度相当边缘化的中国基督史研究固然还不能算是一个积淀深厚的领域，但在经历了从“险学”到“显学”的转变之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海内外学者关于此领域的综述性著作就有多部，¹因此本书不必对此作全面的梳理，只需对与研究题旨相关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一初步勾勒。

（一）基督教的本土化问题

基督教的本土化（inculturation），是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的一种历史现象和运动，它不但包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中国化问题，更涉及近代中国基督新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运动，而从本土化视角研究中国基督教也是学界近年出现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

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多与中西交通史密切相关，²同时带有非常明确的传教史取向，而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³而作为对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回

1 Jessie G. Luts 编：《所传为何？基督教在华宣教的检讨》，王成勉译，台北“国史馆”2000年版；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Boston/Köln, 2001；林治平主编：《从险学到显学：中原大学200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现状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版；林美玫：《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台北宗博出版社2006年版；陶飞亚、杨卫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Two: 1800–Present*, Leiden/Boston, 2010。

2 李金强：《中国基督教研究之兴起及其发展》，载《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港）1998年第1期。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应和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总结，王治心在 1940 年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该书以“本色化”立场撰写中国基督教史，出版后虽受到一些严厉批评，¹但迄今仍被视为中文基督教史的典范之作。事实上，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很早就进入国际学界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视野，在 1927 年和 1934 年先后有两篇博士论文以此为题，²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著述无论在理论上和史上都有可议之处，且带有较强的传教关怀取向，但这类开创性的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战后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相关著述仍表现出明显的以传教士和差会为中心的取向。³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受柯文（Paul A.Cohen）“中国中心”说的影响，裴士丹（Daniel Bays）开始倡导对中国本土基督教的研究，并出版《基督教在中国：从 18 世纪到当代》一书，收入 20 篇论文，该书的出版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取向的重要转变。裴士丹本人一直重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他对传教士在早期撰写的很有影响的中文小册子《两友相论》进行讨论，以此分析中国信徒对于善与恶、罪与拯救的认识⁴。裴士丹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基督教本土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自立教会和本土教会领袖，标志着中国教会走向成熟⁵。

柯文则比较分析了戴德生与李提摩太两种传教方式，认为戴德生对于

- 1 徐以骅：《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载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徐以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12 页。
- 2 Hendon Mason Harris, *Indigenous Churches in China*,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Th. D., 1927; Frank T. Woodward, *The Baptist Problem of the Indigenous Church in China*,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Ph. D., 1934.
- 3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4 Daniel H. Bays, “Chriantian Tracts: The Two Friends”,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1985, pp. 19—34.
- 5 Daniel H. Bays, “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pp. 307—316.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多方面问题缺乏回应的能力，且很少注意对官绅阶级的福音工作，因此传教进展缓慢，已经信教的平民影响力也很有限，不过从属灵的影响力看内地会坚持严格的属灵原则，这对中国教会是无法磨灭的贡献。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十分广泛、自然，后期尤其重视文字工作，在传播西方文明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其宗教作品中则设法摆脱地方性的基督教色彩，对中国传统习俗如祭祖等十分容忍，总的看来李提摩太的工作在中国急需变革的时期有其时代意义，但却错将传教手段当作目的，丧失了福音工作的永久性。柯文认为，须将李、戴的传教方式结合起来，既努力尝试本色化神学，又重视强有力的福音信息和个人工作，“基督教的传教工作才能获得高深广远的具体效果”。¹

鲁珍晞 (Jessie G. Luts) 与雷·卢兹 (R. Ray Luts) 通过福汉会 (The Chinese Union) 的成立、发展与解散来分析郭士立 (Karl Gützlaff) 等传教士对待本色化的态度，² 她还通过鲍乃德 (Eugene Barnett) 玛利诺神甫会诸会友的宣教实践来揭示传教士对待本色化的不同取向，在她看来，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本色化主张各不相同，但都未被广泛认同，或受差会和其他传教士批评，或为中国社会尤其是民族主义者所不容，她认为缺乏宗教自主领域的中国，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本色化只能是将教会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中国人³。鲁珍晞与雷·卢兹对八名客家基督徒个人信道历史与客家地区基督教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⁴。与学术界认为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开始于 20 世纪的看法不同，鲁珍晞还坚持认为本色化进程开始于 19 世纪，这一进程在本土布道员向问道者讲道和传教士译介基督教作品两个方

1 柯文：《戴德生与李提摩太传教方式之比较》，苏文峰译，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第 121—137 页。

2 Jessie G. Luts and R. Ray Luts, “Karl Gu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 The Chinese Union”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69–291.

3 鲁珍晞：《传教士对本色化的态度》，钟越娜译，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52—381 页。

4 Jessie G. Luts and R. Ray Luts, *Hakka Chinese Confront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850–190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面得到展现。¹

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通过研究清初杭州地区一群士大夫信徒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挣扎和取舍来回应谢和耐的看法。在他看来，这群杭州文人士大夫之所以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有助于实现儒学的终极目标，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古代的真道（True Way）。孟德卫认为杭州基督徒的经验尽管无法挑战基督教在17世纪和18世纪对中国文化影响有限的看法，但反驳了基督教不能被中国文化吸收和容纳以及坚持中国中心观的士人不能接受外部影响的说法。²

港台学者尤其是香港学者很早就关注本土教会和信徒的研究，³而在研究反教运动和基督教本色化方面，赵天恩的贡献尤巨，他认为非基督教运动促成中国教会的觉醒，使他们从传统的以教会为单位的思考模式转向以社会为背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待本色化，认为本色化就是认同中国百姓、社会和国家。⁴林洪荣则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五种本色神学的模式，即从中国文化立场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模式、寻求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相融合的模式、成全（中国文化）而非废弃的模式、文化二元观的模式、基督教审判文化的模式⁵。

台湾中原大学林治平教授一直关注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问题研究，与许多学者不同，林治平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基督教本色化的缘起与发展，而且从神学和信仰层面探讨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必要性与可行

1 鲁珍晞：《本色化基督教在19世纪的发端》，2002年10月10—12日上海“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

2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angzhou*,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1–2.

3 李金强前引文。

4 Jonathan T'ien-en Chao,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hurch Movement, 1919–1927: A Protestant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6; 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版。

5 林洪荣：《“五四”时期的本色神学思潮》，载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61—686页。